

从经济学者到教育改革者:钱颖一的变与不变

■刘玉海 孟静 / 文

尽管被视为中国最具国际化色彩、最顶尖的经济学者,尽管刚刚获得2016年中国经济学奖,钱颖一仍然婉拒谈经济问题,尤其是当下热点经济议题。

他的理由是,这份奖项的荣耀只是对他20多年前经济学研究的肯定,而他从2006年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之后,便将全部精力投入在经济学教学管理和改革上,已经不再是经济学一线的研究者——他做不到他所尊重的法国经济学家拉丰那样,既投入经济学教育,又不放弃一线研究。

得益于清华经管学院特殊的背景——由前总理朱镕基创立,钱颖一在北京、清华经管学院这一中国最核心、最受瞩目的地方开展了一系列教学和院系治理体系改革。2016年年底面试的两卷本《大学的改革》,便是钱颖一这十年经济学教育管理和改革探索的一份总结。

相较于早年张维迎在北大、同时期朱清时在南方科技大学改革的万众瞩目,钱颖一的改革堪称低调——因为在他看来,中国30多年经济改革最重要的经验之一便是“先做后说”。

而以经济学的思维来推动教育改革,则是他最为自豪的一点;甚至他放弃经济学研究投入经济学教育的发展,这里有一个反差和对比:边际效益最大化。

一、为什么教育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

经济观察报:就像您在《大学的改革》一书里面讲的,教育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,所以好像大家对教育都不满意——群众不满意,政府也不满意,那么,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一直在往前走,但教育改革会落在经济改革后面,制约因素是什么?

钱颖一: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,经济发展就成为基本国策,改革开放,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。经济有几个特殊性,是教育不具备的:第一,经济增长速度从80年代初开始就很快,在10%左右,而中国高等教育比较快速的发展,是在1998年以后。第二,经济的效果是直接的,且容易度量;而教育的效果往往比较长期,且很多,是很难度量的。第三,经济改革主要就是两条:“开放”和“放开”。“开放”就是增加国际贸易、引进外资;“放开”一是把激励搞对,二是市场做资源配置。结果,一方面,非国有经济快速增长;另一方面,国有企业通过改制、引入战略投资者、上市,激发活力。但相对应的这类改革,在高等教育里面没有。中国的研究型高校都是百分之百国有,中外合作的学校很少。

这样一对比就可以发现,高等教育相对于经济中的企业而言,有特殊的“生产方式”,见效周期特别长,效果很难度量,也有特殊的“产权结构”。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,教育体制往往比经济体制更为僵化。另外,在我们国家,由于教育跟意识形态相关,所以教育改革受到更大约束。

经济观察报:这是从整体上来看高等教育改革为什么滞后。那为什么大家都对教育不满意?

钱颖一:首先,教育的涉及面大,任何企业、机构都要用人才,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对他需要的人才说三道四。很多人都很关心教育,如果感觉好的话,他不会说什么,但是不满意的话,他就会说、会批评。第二,经济发展跟三十年前比,可能涨了20多倍,但是,大家不觉得教育也有同样的发展,这里有一个反差和对比。第三,企业中百年老店很少,但百年以上的大学就不少。没有人拿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企业与现在的企业对比,但高等教育里可以找到这种例子——人们经常拿老清华、西南联大来同现在的高校对比。所有这些因素都会让人对高等教育不满足、不满意。

二、警惕对高等教育成绩的自满

经济观察报:您在书中明确提出“大学为学生”,相对于中国过去长期强调的教育为国家发展和建设服务,无疑是认识上的飞跃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和国外的交流应该说很充分,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学的管理者,出国访问的并不少;但另

一方面,像您书中有篇文章介绍大学的学科划分,似乎过了十几年,改革也并没有向那个方向进步多少。在您看来,中国今天对大学、对教育的认知,还存在哪些重大的偏差?

钱颖一:我在海外的大学待了20多年,在中国的大学也待了十几年。现在清华经管学院的教师,没有一个没出过国的,区别是时间长短:很多是在海外念的博士,至少在海外待了五六年;有一些当过教师,至少待了十年;最少的,也都出去过至少一年、半年;也经常有很多国外的教师来访。所以,中外高校间的交流并不少。

但是,对国外大学的认知可以有多层次。改革开放早期,出国的留学生基本都是研究生或者访问学者,他们基本上局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,对美国大学的一般情况,尤其是本科教育情况并不了解。特别是,绝大多数出国的是理工科学生,也不需要对整个大学制度有认识。但过去十年,情况开始变化,越来越多的人出国读本科,大概在五年前,中国到美国留学的本科生第一次超过研究生。而且,现在在国外大学任教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,所以对美国大学的了解在进一步增加。

你刚才说的那篇介绍大学学科布局的文章,是我在2003年写的。我2002年到清华担任特聘教授,为本科生讲课,跟当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谈大学学科布局问题。他觉的有意义,让我给清华领导们讲一次,所以我在2003年1月讲了一次。之后他又建议我把它写成文章,后来发在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》上。

到了今天,这篇文章也是我所有有关教育的文章中,被教育管理者引用最多的一篇。为什么它很有影响?特别是对像清华这样的学校?因为清华原来是工科为主,大家总觉得工科是大学中最基础、最主要的学科。而我那篇文章中最重要的是一张图,把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人文作为最基础的学科,把工科作为应用学科。如此一对照,清华整个的学科结构就显得不平衡了。这就形成很大的冲击。

但是,大学的惯性很大,即使知道了这个学科划分更为科学,但改起来很慢。不过,跟十年前比,还是有不少变化。清华增强了人文、社会科学、生命科学这些学科,在2016年12月30日,又刚刚成立了地学系——那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;还有其它一些改革,比如把人文和社会科学分为两个学院,也是受这个图的影响——原来是一个学院——人文社科学院。我那篇文章讲,尽管都叫文科,其实人文和社会科学是不一样的,社会科学都需要科学实证。我那篇文章还讲,美国的一流大学的共同特点,是所有基础学科是完整的,但应用学科,即职业学院,未必是全部的,也不必是全。

经济观察报:而且即便知道,做增量改革容易,做存量改革很难。

钱颖一:还是跟企业做比较,企业一条产品线不行了,那就关了,再开一个别的。但大学不行,大学的老师是没办法解雇的。这是大学和企业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,大学要转型,时间上非常之长。这方面其实全世界都一样。所以,有人说大学是所有机构中最保守的。一方面人们希望大学是最创新的——因为大学是创造新知识的地方;但是另一方面,它的组织结构又决定了它是最保守的。

关于中国教育还有一点要强调:国人的看法和外人的看法会不一样——国人往往更会看到缺点,而外人更会看到优点。比如,在1998年以后的不到20年,中国高校每年录取学生人数是1998年的7倍,达到700万,这是全球最大的规模。从质量上看,也让外国人很吃惊——中国在顶级自然科学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目,2005年在全球占比是13%,2015年增加到20%。现在随便打开一本《科学》杂志,每一期上都有中国作者的名字,不管这个中国人在哪儿,可能在大陆,可能在美国,可能在欧洲。其实这并不奇怪。中国的经济总量2005年在全球是5%,2015年是15%。可以看到,科学研究的增长跟经济的增长是同步的。所以,在外人看来,中国这十几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——数量上没得说,每年录取从100万增加到700万,毛入学率已经

是40%;质量上,进步也很快。拿清华经管学院来说,十年前我们没有一个教学项目能排入世界前列,现在我们的EMBA国际项目(TIEMBA)在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上排名全球第一。在外人看来,这种进步不得了。

那为什么国人觉得教育不够好?部分原因是由于快速扩招,“边际”和“平均”质量都有可能没有提高,甚至下降,尽管精英部分在提高。另外,人们对教育的要求也提高了。

不是说中国教育没问题,有很多问题;但是要客观地去分析。从历史的角度看,中国现在跟美国一百年前的情况很像,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,所有人都在批评教育质量下降,因为原来是精英教育,大规模扩招后教育的平均质量肯定受影响。但是横向比较,这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进步,从海外看还是觉得很震惊。

经济观察报:但是可能我们国人还是比较着急,觉得我们的一流大学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

钱颖一:我们对标的标尺总是哈佛、耶鲁、牛津、剑桥。有这种对标挺好,说明我们高标准,不满足现状。我现在更加担忧的,倒是现在容易产生自满的倾向。觉得自己不够好、有差距,对中国人来讲是好事——知道自己还不行,就可以努力追赶;相反,如果觉得我们已经很好了,那就有问题了。

经济观察报:这个自满现象在如今的高等教育圈很普遍吗?

钱颖一:不一定普遍,但是有苗头。现在我们在自然科学和工程领域的论文发表确实增长很快。但是,与我们的巨大的人口基数和高校教师学生人数相比,我们的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都不太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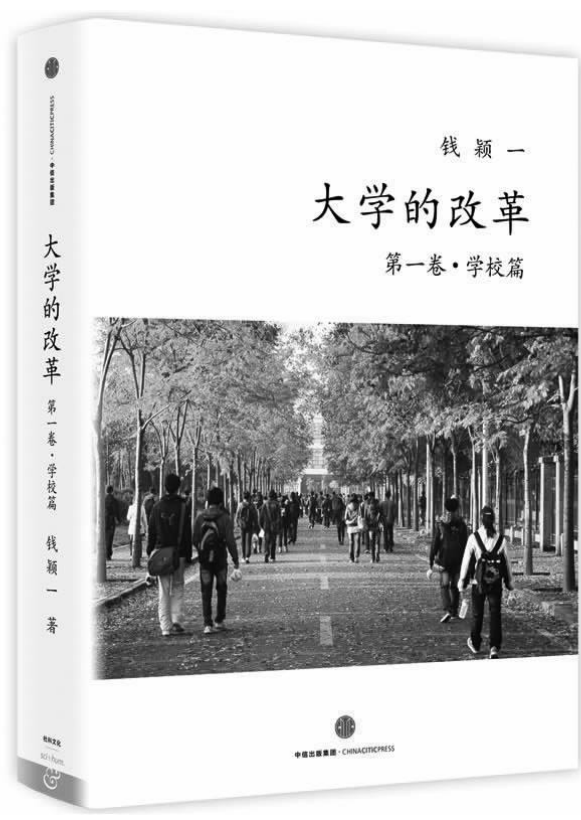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我的改革经验是“先做后说”

经济观察报:我们看到,2000年之后,中国高校确实有一些改革尝试,但是步履维艰;而您在清华经管学院——这个非常焦点的地方——所做的很多改革,都在稳步向前推进。在教育改革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,才能成功?

钱颖一:过去这些年,高等教育各个方面确实都有改革,比如本科层面,北大有元培学院,复旦有复旦学院,浙大有竺可桢学院等;博士培养制度,中国以前跟欧洲比较像,现在逐渐跟美国比较像。另一层面是关于高校治理制度的改革。我们经管学院的改革经验是,先做后说。这也是借鉴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经验,比如特区建设,如果先争论,这事就办不成了。

教师人事制度改革,细节非常重要。这比国有企业改革还难,企业职工可以买断下岗,但是高校教师不行。怎么能够在具体的条件下做成改革,就是在有约束条件下的优化问题——这是经济学的基本思路,也是清华经管学院改革中一直遵循的原则。改革中常见的有两种错误:一种是没考虑到约束条件,那改革肯定会失败;还有一种是过多地去迁就约束条件,那改革就会走样。在教育改革中这两者都有,教育改革中也有这两种情况。

课程改革比招生改革要容易;招生改革中,研究生招生改革又比本科招生要容易。所以我们就先做课程改革,先做研究生招生改革。课程改革要考虑约束条件,不能把有些课全部停掉,而是先把一些课的学分减一减。我们在MBA课程改革之后进行MBA招生改革。过去,MBA生源的竞争就跟高考竞争一样,比谁的录取分数线高。本科这么去争可能还可以,但是MBA招生如果这样做显然就不对了,因为MBA更看重人的实践经验和领导潜质,这是不能从考试成绩中发现的。在清华经管学院之前,有的高校先做了MBA招生改革,一部分人采取面试。但教育部不认可,因为国家规定MBA入学必须都要参加MBA入学考试,不能一部分人考试,一部分是面试。考试绕过去——这就是约束条件。在这个约束条件下怎么优化?清华经管学院的做法是,先面试所有人,选取符合要求的人,给予“条件录取”,然后要求申请人参加MBA入学考试,但只要考过国家线就可以了。这么做,既满足了教育部的要求——每个



《大学的改革·学校篇》
钱颖一 / 著
中信出版社
2016年9月

人都要参加入学考试,但又并不是在录取分数线上竞争,因为主要的信息来自面试。这就是满足约束条件改革的一个例子。

经济观察报:您在清华做的这些改革,是不是可推广?

钱颖一:MBA招生改革的方法已经推广了。因为我们大框子没越过,这就可复制,而且容易复制。

有些容易复制,有些就困难。比方说,通识教育课程的设计是可复制的,但谁来教、教出什么效果,是没法复制的;学生投入多少时间来学习,也没法控制。

经济观察报:在我看来,您做的非常困难的改革是教师聘任和薪酬制度的改革,尤其是薪酬改革?

钱颖一:教师薪酬制度改革就是改“计件制”为“年薪制”。过去的薪酬体制是计件制,很容易让教师去追求短期的论文发表和发表的数量。美国高校普遍使用的是年薪制。但在中国实行年薪制遇到了问题:在国外,教师的年薪是院长说了算,但在中国就不行,大家会说凭什么叫年薪?中国是人情社会,定多了还是定少了,说不清。在我们的改革方案中,薪酬不是由院长决定,而是由一个薪酬委员会决定,建立大家都认可的规则,薪酬委员会委员一人一票。投票结果,教师可以不同意,都有一次机会复议——在清华经管学院确实有复议的,每年都有。由于我们的规则是公平的、透明的,所以年薪制改革很顺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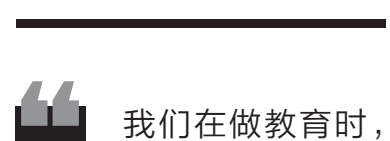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很多国内高校在进行海外招聘的时候,是实行年薪制,但是国内教师仍然是计件制,所以是薪酬双轨制。清华经管学院以前也是双轨制,但从2012年起所有教师都变成年薪制,到现在已经实行五年多了。

经济观察报:在清华经管学院,从教育教学到学院治理、聘任薪酬,各个层次的改革,您基本都做了一遍,接下来您还准备做哪些改革?

钱颖一:教育改革永无止境。比如通识教育,课程设计好了,但什么人教、怎么教,学生花多少时间学,都大有改进余地。比如写作课,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还需要有很大提高;再比如批判性思维课,是我们特别力攻的,我们也在继续改革。

我们在去年11月举办了一个关于批判性思维教育的研讨会。批判性思维教育是创新教育里很重要的方面,但要真正做好,很难。我们虽然已经开出了“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”这门课,但是如何提高其质量,我们也在规划,推出改进方案。

经济观察报:我心里始终有个疑问: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实际上生在一个社会环境里面,再好的大学教育,或者说您在主张的理念——比如批判性思维,最终当你回到这个社会环境的时候,效果其实很难讲。



我们在做教育时,不能简单地去想办法把创造力培养出来,而是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刻意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,甚至是他们的“胡思乱想”。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是很欠缺的

年4月成立的。清华x-空间的定位不是以项目为中心,而是以创新创业教育为中心。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教育,所以一开始就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孵化器,而是作为一个教育学生创造力的平台来建设。这就避免了后来很多学校出现的问题。另外,非常重要的一点是,这个创新创业的教育平台不仅是经管学院一家的,而是联合清华14个院系建设的——即使在哈佛、MIT,也很难把其他的院系联合起来。

因为它是教育平台,所以它和孵化器是对接关系,而不是竞争关系。到目前为止,已经有将近1000个团队进驻清华x-空间:创意阶段的团队超过一半,创新阶段有1/3,创业阶段的不到10%。这是对的——只有很少部分学生愿意在这个阶段创业,其他人未必不创业,但他们可能多年后才创业。不过,在学校可以给他们播下种子,因为我们教育他们怎么去思考创新,教一些基本的商业计划制作的技能。

第二个问题就更深层次了。创新教育最终是为了提高人的创造力,这是最终目标。谈到培养创造力问题就又回到“钱学森之问”。我们传统的教育观念是,教育是传授知识。传授知识越多,积累的学问就越多,隐含着你的创造力就越多。其实不是。我猜测,创造力可能是两个东西的乘积:知识与好奇心和想象力——后者随着教育的越多,有可能是下降的。因此,这两个变量的乘积就可能变成一个“倒U”型:太少知识的时候,好奇心和想象力非常好,但做不出什么东西来;知识很多的时候,如果限制了好奇心和想象力,也没有创造性了。所以,在“倒U”型的中间,有些人辍学了,倒反很有创造力。当然,这跟环境很有关系。如果环境比较宽松,始终可以保持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,创造力可以随知识增长而增长。

如果我的这个猜测是对的,那么“钱学森之问”就偏颇了。我们在做教育时,不能简单地去想办法把创造力培养出来,而是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刻意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,甚至是他们的“胡思乱想”。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是很欠缺的。我们的教育体制鼓励寻求标准答案,如果你跟别人不一样,就会受到批评和打击,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受到压制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们的体制在扼杀和压制创新,也许并非有意,而是在我们努力教学生的过程中的一种连带效果。

经济观察报:以您对中国的体察,在可预见的未来,中国的教育改革,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,如何寻找改革突破口和改革路径?在哪些领域有可能形成改革突破?

钱颖一:不好说。为什么?还是拿企业做对比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,是非国有企业——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和外资的进入。1980年《外资法》出台之后,外资可以百分之百在中国建立企业——外资带来的不光是好的产品,也告诉我们怎么经营,并带来竞争。而这在教育界是没有的——高等教育现在大概只有十来家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,而且受很多限制。而目前中国的民办高校还都不是研究型大学,更不要说是高水平研究性大学了。

再比如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,最大的突破是重组上市。在90年代末,我们的银行情况很糟糕,后来成立了4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,成立了汇金公司注入资金,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,然后上市——这个路径很成功。但是大学改革并没有这个机制,但成本肯定要更高一些,这没办法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努力。根据我的经验,我们的努力还是有一些效果的。

四、高校创新教育不能急功近利

经济观察报: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——也就是您谈到的“均值”与“方差”的问题,究竟该如何辩证的处理?另外,您在清华很早就开始了创新创业教育的探索,而后来随着政府对“双创”的推动,高校也出现了众多创业班,舆论对此则批评甚多,您怎么看?创新创业教育在高校究竟如何落地?

钱颖一:经管学院做的创新创业教育的平台清华x-空间(清华x-lab),是从2012年开始讨论,2013

经济观察报:不能太乐观?

钱颖一:不管是悲观和乐观,还是有所作为——从这一点来看,我是行动者。你也可以说过于乐观,但是所有创业者都是过度乐观的——在这一点上他们似乎是“非理性的”。你去问所有创业者的人,他们都会相信自己有高于50%的概率成功。但是,事后去看,他的成功概率可能只有10%。人类需要有这样过于乐观的人,不然社会就很难进步了。☑